

论历代的诸葛亮崇祀

——以官方崇祀为中心

刘森垚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南充 637002)

摘要: 诸葛亮的崇祀活动始自蜀汉政权时期, 诸葛亮生前其功绩已被各方传扬, 身后千年, 崇祀地位同样被不断抬高。经魏晋南北朝的初步发展, 诸葛亮崇祀在唐代得到士人和武将的极大推动。两宋之交, 诸葛亮崇祀再获新生。明清时期, 伴随着《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 诸葛亮崇祀活动进一步得以扩展。

关键词: 诸葛亮; 崇祀; 发展

中图分类号: K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2(2014)02-40-07

自蜀汉时期对诸葛亮早期崇祀活动开始, 千年以来的文献、论著很多都曾谈及人们对诸葛亮的喜爱、敬奉、崇拜。诸葛亮在民间很大程度上成为智慧的化身, 在社会中上阶层中则往往以“贤相”“儒家楷模”的形象出现, 在国家祭祀中尤以“良将”身份最为突出。诸葛亮的崇祀活动是以多个层面、多种角度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本文将立足中央祭祀, 以官方与民间的互动视角来探讨诸葛亮崇祀地位的变动情况。有关诸葛亮崇祀的史料庞杂混, 以下将就就此问题做一简单初步梳理。

一 发展前期: 魏晋南北朝阶段

诸葛亮卒后, 刘禅谥其为“忠武侯”, 地方上则“所在各求为立庙”。后主虽然在诏文中自称“朕用伤悼, 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 纪行命谥, 所以光昭将来, 刊载不朽”, 但是朝廷并没有同意为诸葛亮立庙祭祀, 以至于“百姓巷祭, 戎夷野祀”。最后在文武官员的一再请求下, 于“景耀六年春, 诏为亮立庙於沔阳”^[1], 这便是最早的孔明庙(此时成都尚未出现孔明庙)^①。据《方輿胜览·卷五十一》记载, 东晋桓温伐蜀, “夷少城, 独存孔明庙”, 这就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成都武侯祠的前身^[2]。“1780 年来, 它(成都武侯祠) 赢得了历朝历代、各个民族、各种语言、各个

层次人们的长期的崇敬和关爱……在这 1780 年中, 武侯祠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文物特色, 这就是建筑、塑像、碑刻、匾联、园林五位一体; 逐渐突出了自己的文物风貌, 这就是蜀汉惠陵、唐代碑刻、明清匾联、清代建筑、古柏园林。”成都武侯祠作为研究千年以来诸葛亮崇祀的最直接切入点, 学者罗开玉已经撰写长文进行了细致精审的系统梳理^[3], 这里就不再赘述。

宋代祝穆《方輿胜览》云“桓温平蜀, 夷少城, 犹存孔明庙, 后封武兴王, 庙至今祠祀不绝。”或曰诸葛亮在东晋已被封王, 此说尚可商榷。孔明在东晋封王, 独见于《方輿胜览》此处; 若句读断为“夷少城, 犹存孔明庙。后封武兴王, 庙至今祠祀不绝”, 则理解也会发生变化。从东晋的封爵制度来看, 诸葛亮在此时封王也是不可信的。据《晋书·卷二十四》记载, 西晋咸宁三年(277) 对封王制度进行了调整, 确立了“非皇子不得为王”原则, 但到了西晋后期因功封王者不在少数, 这又成为引起“八王之乱”的重要原因。东晋王权衰弱, 吸取了西晋覆灭的教训, 封王者仅为个别宗室, 连王导、陶侃、桓温、谢安也只是封到郡公。虽然说两晋之时怀念孔明之风犹存, “声烈震于遐迩”^[4], 但是毕竟从曹魏到西晋、再到东晋的统序一直传承, 诸葛亮不可能在东晋封“王”。但

收稿日期: 2013-10-28

作者简介: 刘森垚(1989-) 男,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研究生。

不论怎么样,李雄时期在成都创建诸葛庙是毫无疑问的,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二 发展中期:隋唐宋元阶段

至于唐代,情况则大不相同。诸葛亮不仅被纳入中央祭祀,而且封号晋升到了“王”爵。诸葛亮之所以获得这些殊荣,一方面是自南北朝时期延续下来的对孔明的治国、治军的推崇,另一方面还是跟当时门阀大族衰落、寒门士人的崛起所带来思想感情倾向有很大的联系。他们一方面希望自己能够为国家“鞠躬尽瘁”,另一方面则是“思得明君”。因之,诸葛贤相的形象寄托了士人这样的强烈感情,在唐诗中尤为明显。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诸葛亮的崇祀地位被猛然拔高。毫无疑问,“唐代是诸葛亮崇拜形成的关键时期”^[5]:第一,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两京及天下诸州”始设太公庙。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升太公庙为武成王庙以张良及“十哲”配享,诸葛亮便是十哲之一^[6]⁴³⁵。“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李唐王朝胡风很盛,马上得天下,对军事活动向来重视。文士们也大都带刀捉笔,钦佩诸葛亮南征北伐、有“王佐之才”。因此,诸葛亮崇祀首先在“太公庙”这个“军神”祭祀活动中得以体现。朝廷要求“天下诸州”均要设立太公庙,谋图将国家意识深入贯彻到地方基层^②。第二,唐玄宗天宝七年(748),皇帝下诏,“其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史籍所载德行弥高者,所在宜置祠,量事致祭”,其中忠臣有十六人,诸葛亮居其一(三国时期唯一人物),“并令郡县长官,春秋二时择日,准前致祭”^[6]⁴³¹。作为“忠良”的代表,朝廷诏令各地立庙祭祀诸葛亮^③。诏令里所谓“德行弥高”便是标准,通过指定崇祀对象对全国各地实行德化便是直接目的,这其实也是在贯彻国家意识。第三,唐宣宗光化三年(900)^④,诸葛亮被封为武灵王,并赐庙隆中(《舆地碑目》记载隆中有《改封诸葛亮为武灵王记》)。不同于以上两则,据笔者推测,这次封赐很有可能是属于地方神明“发扬神威”而被官方利用的情形——光化元年(898)到天佑二年(905),朱温不断侵扰荆襄节度使赵匡凝,赵氏难以招架。很有可能在此期间,赵匡凝在襄阳城外重修诸葛庙并重封其为武灵王,以求神明相助、保全自己。此时尚不能把赵匡凝看做是一

般的割据政权:唐室衰微,只有荆襄赵匡凝贡赋不绝,因此得到中书令的官职。某种意义上讲,这次高规格的加封仍然是具有中央、官方色彩的。

据《蜀梼杌》,永平二年(912)前蜀加封诸葛亮为“安国王”、张鲁为“扶义公”^[7]。紧接上次加封,前蜀这个完全意义上割据政权仍然继续了前代对诸葛亮的加封政策——永平元年、二年,前蜀与岐国正在兴元府(汉中)一带交战^[8],前蜀之意恐怕仍然是想通过对前世镇守汉中的两位知名将领的加封,以求神明相助、保全本府。这次加封可与光化三年(900)加封诸葛亮“武灵王”等量齐观,这其实说明对诸葛亮的崇拜已经是那个时代中上流阶层的普遍意识^⑤。不得不说,经过唐代长时间的发酵和酝酿,诸葛亮的崇祀地位确有极大的提升。

宋太祖乾德元年(963)调整武成王庙的祭祀名录、顺序,关羽、张飞、被请出武成王庙,而诸葛亮仍旧从祀^[9]。这次整顿祭祀是在五代乱象丛生、新朝刚刚建立的情形下,最高统治者想通过“资假阴助”、“以今议古”,借助“生前身后名”和“掌握祭祀、伦理的威力”来约束从前泛滥的武将,从而达到重整纲常、重新确立统治秩序的目的。诸葛亮的保留,正好印证了上文所谓——在唐代“诸葛亮的崇祀地位确有极大的提升”,崇拜已经深入人心。不论官方和民间,诸葛亮都有很高的威望,士大夫阶层尤以为楷模,因此“乾德升降”未予罢黜。虽然诸葛亮再次逃过一劫,但是“对于前代所加封爵,宋王朝是不予承认的,往往通过改赐、增封等方式赐给新的封爵,以赋予新的正统含义”^[10],宣和五年(1123)礼部奏议,诸葛亮又被改封为“顺兴侯”^[11],这种情形与明代初年的情况很相似——明朝初创,明太祖为重立秩序而将“后世溢美之称,皆与革去”,因此关羽宋元所赐公、王封号都被撤销,只能使用“寿亭侯”本称^[12]。同时,宣和五年再一次对武成王庙祭祀顺序做了调整,“于是释奠日,以张良配享殿上,管仲、孙武、乐毅、诸葛亮、李绩并西向,田穰苴、范蠡、韩信、李靖、郭子仪并东向”^[11]。相较开元十九年诸葛亮所在第八的位置而言,这一时期诸葛亮崇祀地位确略有抬升。

据《文献通考·宗庙考十三》和《宋史·吉礼八》的记载,宋太祖开宝三年(970)下诏为“前代功

臣烈士”修墓致祭^⑥。毋庸置疑,宋太祖继承了唐玄宗天宝七年开祭“忠臣义士”之举,而且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为诸位功臣烈士之祠墓设置守陵户。学者罗开玉据此认为“宋朝廷已明确表态:蜀汉是三国正统”。其实非也,乾德年间,宋太祖曾诏祭历代帝王。帝王行列中均是曹魏诸帝,不见刘备踪影。此时却只以昭烈帝身份被放置在“功臣烈士”名属下,明显不认可其为正统。另外,北宋中前期编著的几种史论、史书,比如欧阳修《明正统论》和司马光《资治通鉴》等均以曹魏为正统,而宋廷以蜀汉为三国正统则要到北宋中晚期了。

两宋之交,气候转冷,北方少数民族为求生存而逐步南侵,在民族危机极具加深的背景下、在长时间的军事斗争过程中,诸多蜀汉人物受到官方和民间的一致大力推崇,这其中就有诸葛亮。如唐高宗上元元年敕文所说,“定祸乱者,必先于武德;拯生灵者,谅在于师贞”,诸葛亮之所以入祀武成王庙就在于他以“王业不偏安”而率弱旅北伐强魏,有武且有德,能征而道正。赵构南渡,亦如晋元帝偏居,最高统治者未必誓要北伐复国,而“绍祚中兴”往往成为了一般文士武将的满腔热忱,这些人便常以诸葛亮为自己行事的典范和楷模。建炎二年(1128),抗金名将宗泽临终前吟诵杜甫歌颂诸葛亮的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呼“过河”而逝^[13]。据褚人获《坚瓠余集·卷四》记载:

嘉隆间,金陵沈越《闻见杂录》载,按江西时过白鹿洞书院,内诸葛亮木刻小像诸生焚香供之。询其所以,皆云其来已远,未知所由。后观朱文公年谱,言先生尝作卧龙庵,祀孔明,即其地。而木刻像乃文公所立,彼时门人言其微意有在尽朱子之意,以高宗南渡之后偏安江左,委靡颓坠,不能振发恢复疆土以雪仇,故于孔明致意焉。

朱熹不仅多次撰文称赞诸葛亮,而且把崇奉之意落于实践。木像、偶像和崇拜相关联,焚香、供奉和祭祀相联系,在文士领袖的垂范下,诸葛亮崇祀在士人心中的地位较之唐时则更上一层楼。南宋初年,这种文士集体的感情倾向已经体现在了武成王庙的祭祀活动中,诸葛亮的崇祀地位由“从祀”上调到“配享”,总排名在太公望和张良之后,位列第三:

高宗南渡以来,复建太、武、宗三学于杭都……

武学,在太学之侧前洋街。建武成殿,祀太公,曰昭烈武成王,以留侯张良、武侯诸葛亮配,累朝诸名将从祀。^[14]

比之北宋宣和五年的祭祀顺序,确有大幅度的提升,真可谓“时势造英雄”。即便这样,当时的仁人志士仍觉不够,认为诸葛亮为人、功绩绝不输给张良——胡寅《诸葛武侯论》:“三国人材之盛后世鲜及,然诸葛孔明则高迈独出,眉山苏子以为‘巍然三代之佐’,未易以世论,斯言当矣。孔明可亚于伊傅而以管乐自许,谦志也;才与仲父等而德则过之。或曰,方诸子房何如?曰,是殆难以优劣论也,然志士尚友愿希孔明而未必为子房。”朱熹《诸葛武侯全三郡论》:“武侯名义俱正,无所隐匿,其为汉复仇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补于天下后世,非子房比也。盖为武侯之所为则难,而子房投间抵隙,得为即为,故其就之易耳。顷见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从容,子房不若孔明之正大。”

接替赵构的宋孝宗想要有所作为,但却是“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北伐失败,然后就是“隆兴议和”。但是孝宗皇帝不甘心,任用王准、虞允文等整顿备战。自乾道二年(1166)到乾道六年,朝廷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阅兵活动,极具鼓舞人心之作用。乾道三年,孝宗任命虞允文为知枢密院事,乾道五年八月,孝宗召虞允文入朝,升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积极为北伐做充足准备。在这样的形势下,对曾经坚持北伐的诸葛亮的褒扬加封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据王象之《舆地纪胜》:“威烈武灵仁济王庙,在襄阳县伏龙山……乾道四年,被旨以感应,赐英惠庙额,加号仁济。”^⑦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加封的地点在襄阳,而襄阳此时正处于抗金战场的最前线。按道理除去此次加封的“仁济”二字,诸葛亮在乾道四年以前应当还有加号“威烈”、“武灵”的“封王”过程^⑧,而据《宋会要辑稿》“诸葛武侯祠”条记载,诸葛亮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十二月方才加封为“仁智忠武侯”。也就是说隆兴元年到乾道四年的6年时间里,两宋之交的诸葛亮崇祀完成了从封侯到“封公”、“封王”的程序,真谓之“神速”^⑨。以上推测虽史无明载,但是这短短的6年时间却也正好是宋孝宗初登大宝、蓄意进取、实践北伐的几年,以极力加封诸葛亮作为激励人心的手段,也是情理之中的

事情。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北方少数民族王朝对诸葛亮的冷淡态度。据《金史·礼八》载“泰和六年(1206),诏建昭烈武成王庙于阙庭之右,丽泽门内,其制一遵唐旧礼。”这就意味着,诸葛亮在武成王庙内的崇祀名次又恢复为第八,地位有所下降。泰和七年,情况变得更糟——“完颜匡等言:我朝创业功臣礼宜配祀。于是以秦王宗翰同子房配武成王,而降管仲以下,又跻楚王宗雄、宗望、宗弼等侍武成王坐,韩信而下降立于庑。”这样一来,在武成王庙的排位中,诸葛亮不仅恢复唐代名次,而且降低了崇祀等级,只能“立于庑”。当然,崇祀地位的下降不是针对诸葛亮的,与南宋刻意拔高诸葛亮一样都只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泰和年间,金朝诚谓多事之秋,战争频繁。尤其是泰和六年,南有韩侂胄北伐,北有蒙古国建立兴起。金朝统治者怀念开国时期的战无不胜,将宗室将领纳入武成王庙,定是抱着崇敬武功、护佑武运的目的。

元初以“援唐宋之典故,参辽金之遗制”(郝经语)创立法度,变革了金朝典章,同时也可能吸收了两宋制度。就武成王庙祭祀而言,重新进行了位次的排定。《元史·祭祀志五·武成王条》载“武成王立庙于枢密院公堂之西,以孙武子、张良、管仲、乐毅、诸葛亮以下十人从祀。”^[10]这样一来,诸葛亮在此庙中的地位上升到第五,比南宋时期要低,但是相较金章宗时期则要高出很多。元代中期,民族矛盾加剧以及诸如《三国志平话》一类完整三国故事的出现,再次促成了诸葛亮崇祀地位的逐步恢复和提高^[11]。《三国志平话》虽今存元英宗至治(1321-1323)年间刻本,但其成型、成书乃至刊行则可上推数十年。三国故事在元代的流布无疑是相当广泛的,如《西厢记》中就有“则没那诸葛亮孔明,便待要烧博望”^[15]的说法,杨立斋《般涉调·哨遍》曰“《五代史》止是谈些更变,《三国志》无过说些战伐。”陈翔华先生对此阐释说“从此曲口气看,三国故事当已普遍演唱,而内容久为群众所熟知。”^[16]元代程钜夫所撰《敕修南阳诸葛亮书院碑》一文中在谈及修祠建院宗旨时说到“侯首称‘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间关百折,期复汉祚,春秋之义焕然复明。至今三尺之童犹知贼曹而帝汉者,侯之功也。”^[17]想必元

代如《三国志平话》这类以诸葛亮为主要角色的三国故事,在普及文化与价值观上作用非小,以至于“三尺之童犹知”。宋元时期三国故事中角色文学形象背后的民众心态史,尤其是其中蜀汉人物崇拜心理的发展过程值得深究。“纯粹的平民社会”中崇拜心态和喜恶标准借由文人士大夫和宗教组织不断影响着上层社会,使之逐渐成为官方意志。元武宗(1306-1310)至大初年,也就是《三国志平话》刊印的前十多年,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何玮拜谒南阳诸葛亮祠,“顾瞻徘徊,汽然兴怀”,命令将祠扩建,并在祠旁新建诸葛书院。元仁宗于延佑四年(1315)朝廷正式赐名南阳卧龙岗诸葛亮祠为“武侯祠”,故翰林程钜夫所撰碑文名为“敕修”,可见官方对诸葛亮崇祀的重视。紧接着,至治元年(1321),诸葛亮被追封为“威烈忠武显灵仁济王”,封号美辞达到八字,其崇祀地位再获抬升^[18]。

三 发展后期:明清阶段

明朝建立,朱元璋为重立秩序和政治权威而将各类神仙、先贤烈士的“后世溢美之称,皆与革去”,历代诸葛亮崇祀中的各种封号也被取消,只用“忠武侯”一称。随着朱元璋统一中原,扫荡北元的完成,其对内政策也发生了转变——开始重文轻武。洪武二十年(1387)七月,礼部奏请重建昭烈武成王庙祭祀太公,朱元璋表示明确反对:

太公,周之臣,封诸侯。若以王祀之,则与周天子并矣。加之非号,必不享也。至于建武学、用武举,是析文武为二途,自轻天下无全才类。三代之上,古之学者,文武兼备,故措之于用,无所不宜,岂谓文武异科,各求专习者乎?……太公之祀,止宜从祀帝王庙。遂命去王号,罢其旧庙。^[12]

明太祖废除武成王庙的理由看似是要求学生“文武兼备”,但是这里的“文武兼备”其实不过是“在学宫里设射圃习射而已。所习多为经书,实际上是并‘武’于‘文’。”^[19]这样一来,先前素有从祀武成王庙传统的诸葛亮也被罢黜。然而第二年(1388),朱元璋诏定历代帝王庙从祀名臣37人,诸葛亮名列其中,诸葛亮在从祀名臣中位居十七^[3]。一方面否定武将之诸葛亮,另一方面却肯定了文臣之诸葛亮,其重文轻武的态度昭然天下,看似是“循名

实、正祀典”实际上完全是推行“偃武修文”政策的结果。

当然,推行“偃武修文”政策也要看当时具体的政治环境。不像洪武二十年以后的那种既除边患又无内乱的情况,明朝正统以后边患内忧频遭构连。至嘉靖十五年(1536)前后,逐渐形成了“北虏南倭”的局面,为求“武教有所兴起”、振奋士气,朝廷终于改建武学,“仿唐制,立武成王庙”^[20]。这次重新崇祀武成王,其制度虽曰“仿唐”,但具体内容与唐宋、金元都不相同,此次确定的崇祀名将包含诸葛亮在内总共只有24人。由此可以看出,诸葛亮在明代中央崇祀的起起落落,归根到底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大环境决定的。明清两代,诸葛亮在各类崇祀活动中未能再加封号,大致是因为明清既非偏安王朝,而蜀汉正统也早已确立不再争讼。作为敕封的实施者,朝廷没有一种对诸葛亮特别的政治热情和期望。因之在武成王庙和历代帝王庙中的诸葛亮崇祀,都只是将其归类到一般的武将或文臣范畴中。与中央祭祀的平淡不同,诸葛亮崇祀在地方祭祀中却迅速扩展^④。谭良啸先生统计:

据地方志记载,明代云南一省有武侯祠28座,至清代有34座;清代贵州省有18座,而四川省有40座。仅成都市一地,历史上先后就有过8座武侯祠。直至今日,全国各地保存下来并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武侯祠在10座以上。

经笔者初步统计,明清时期除过西南地方的武侯祠,全国范围内孔明庙(祠)、诸葛庙(祠)、武侯祠还出现在临沂、襄阳、东湖、桂阳、宝庆、庐州、岐山、沔阳、秦州等十余个府县。各地武侯祠中对诸葛亮的崇祀从开始时的一年一祭,发展到春秋祭祀定制;初用少牢,清中期以后改用太牢。地方祭祀如此兴盛,并不是说要与平淡无奇的中央祭祀割裂开来,二者之间还是存在一定联系的。武成王庙从祀人数从唐代的十哲加六十四、宋代的十哲加七十二,发展到明代嘉靖年间减少到只有二十四贤,但是诸葛亮仍列其中。但从军事角度讲,如同陈寿的中肯评价一样“於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幹,优於将略”,诸葛亮并不是一个多么出众的将领。迄周至明,名将何止百员,而诸葛亮在明朝入祀武成王庙就说明时人对诸葛亮的崇祀内容并不是真实的历史本身,

而是一千多年来诸葛亮崇祀所形成的文化意识。也就是说,人们一看到诸葛亮,除了浮现其身份是“贤相忠臣”外,便就是“良将”的形象。这种意识必定是当时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共识,那么它的形成就要仰赖诸葛亮形象在普通民众崇拜心理的演进,在陈翔华先生的《诸葛亮形象史》一书中通过对历代民间文学样式的分析,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南北朝时谓之名士,隋唐谓之智将,宋元谓之军师,明清则谓之“经纶济世”且“神机妙算”。这样看来,诸葛亮之所以能在嘉靖年间进入武成王庙,是因为大众有这样的文化意识。联系到《三国演义》已经大量刊行流播,上层的“明朝历代皇帝(按:此处黄晋先生例举了正德、万历两位皇帝)对《三国演义》等通俗小说和三国戏曲超乎寻常的喜爱”^[21],中层的文人士大夫乐此不疲,下层“愚夫俗士,亦庶几知所讲读焉”^[22],诸葛亮崇祀借助《三国演义》之流布也再获扩展。也正好是从正德、嘉靖、万历这三代,朝廷也颇为重视对诸葛亮的地方祭祀:正德二年(1507),襄阳隆中武侯祠立有《敕赐忠武侯庙额檄文碑》;正德九年(1514),勉县武侯祠,“前明蓝公璋于正德九年疏于朝,请举行祀礼于春秋”^[23]。嘉靖七年(1528),南阳武侯祠立有《赐汉丞相忠武侯诸葛亮春秋祭文碑》;嘉靖二十三年(1544),南阳武侯祠立有《嘉靖乙酉抚民右参政许复礼呈照碑》。万历二十七年(1599),总督李化龙“奉命入蜀”平乱,在勉县立有《祭汉诸葛武侯墓碑》^[24]。另外,自宋代确立了皇权领导下的神明祭祀体系,国家与地方祭祀的互动也显著增强,地方上祭祀活动往往可以体现出“国家的在场”^⑤。对于诸葛亮这样先贤、神祇的崇祀既有利于“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纬阴阳、正纲纪”的实现。这样一来,国家“神道设教”的意识理念便通过具体的地方祭祀圆融在基层社会之中。

清代无论是中央祭祀还是地方祭祀都比较重视对诸葛亮的崇拜,其制式大体沿用明代规范。顺治二年,朝廷重新确立祭祀“历代帝王庙”,诸葛亮仍然作为三国时期的唯一人物从祀其中^⑥。康熙皇帝曾经称赞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乾隆皇帝在《题琅邪五贤祠》一诗中写道“所遇由来殊出处,端推诸葛是全人。”清代诸葛亮的中央祭祀中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雍正

二年(1724)诸葛亮以“先贤”之名从祀于孔庙,在东庑列先儒公羊高等,其中诸葛亮居第六位。诸葛亮作为儒家典范,终于得以从祀至圣、修成正果。

清代诸葛亮崇祀在明代的基础上还有所发展,祭祀规格更隆重、建修祠庙更加频繁,尤以几种“武侯祠庙志”的编纂刊印可看做是诸葛亮崇祀完全成熟和达到顶峰的标志。道光九年(1829),由张合桂主持,潘时彤主笔的成都武侯祠《昭烈忠武陵庙志》十卷、约三十万字撰写完毕,其书“保留了道光九年前清代有关武侯祠的大量史料”^[25]。道光三年(1823),由勉县武侯祠主持虚白道人李复心编写的《忠武侯祠墓志》,在近十年中“稿凡五易”,终于完成。“《忠武侯祠墓志》另辟蹊径,既存诸葛事迹、世系等,又偏重叙写勉县武侯祠、墓”;既有“以祠墓之碑文为主的艺文,也采用精工的图叙。因此它既是全国知名的武侯祠、墓的合志,又不拘于一地一景,具有武侯资料大全的性质,是有别于《忠武志》和《诸葛武侯集》,三者缺一不可的重要文献之一。”^[26]康熙五十一年(1772),由罗景撰写的南阳《卧龙岗志》刊刻完成,此书立足南阳诸葛胜迹,记录了有关诸葛亮的诸多文献,尤其以卧龙岗当地碑刻资料最有价值。就具体的地方祭祀而言,先说勉县武侯祠,其祭祀规格初与隆中武侯祠相同,均用少牢尚飨。但至嘉庆八年(1803),皇帝御制祭文,钦差工部右侍郎初彭龄以太牢致祭,颁发藏香三枝。至嘉庆十六年(1811),周明球援八年御祭之例,部议以筹款致祭。至嘉庆十七年(1812),举行春秋二祀,永著为令。再说成都武侯祠,据《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九十三》:汉昭烈庙……本朝康熙十一年重建,前殿祀昭烈,以关、张、北地王及诸将佐左右配享,后殿祀武侯……总督蔡毓荣、巡抚罗森、布政使金、按察使宋可发等重建,巡抚罗森疏请春秋祭祀昭烈、武侯^①。本次修建与请祀,总督、巡抚都有参与,规格较高。嘉庆二十年(1815),“成、华绅士申请于城南武侯祠春秋致祭。经督臣具题,奉旨‘依议,钦此。’”^②与以上相较,隆中武侯祠的祭祀和发展较为平淡,唯有一次较高档次建筑的事件发生在光绪十三年(1887),时任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广总督的裕禄巡阅至襄,且游隆中,发现“祠构崖上粗完,问草庐所在,则荡然无存久矣”、“军门承示意以重修正殿”、

“此土木之巨工也,非得人莫胜任,遂商诸中府,爱择提标右营副部府李仰尚光甫宾臣。夫宾臣外温厚内精明,受大宪之命,膺督造之”,遂重修武侯祠^③。诸葛亮崇祀在明清阶段的情况大致如此。最后,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传统社会中对诸葛亮官方祭祀也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作为诸葛亮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诸葛亮的官方崇祀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诸葛亮文化的走向和趋势。对诸葛亮崇祀而言,隋唐时期的“武运”祭祀与士大夫崇拜相唱和;宋元时期的民族斗争形势使官方主导的诸葛亮崇拜变得举足轻重;明清时期的诸葛亮崇祀借助《演义》广泛流播和官方“神道设教”祭祀理念的具体实施,最终得以在全国各地、民间基层得到崇高地位。当然,归根到底,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一千多年来的诸葛亮崇拜是因为诸葛亮本身所具有的精神和气质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伦理标准,故而为后来无数人敬仰和感佩。由仰慕到祭祀、由现象到文化,诸葛亮崇祀的社会活动得以千年不衰、遍及全国。

注释:

①称其为“武侯祠”还为时尚早,中唐以前基本都称为孔明庙,之后则以称“诸葛祠(庙)”、“武侯祠”为多。

②然而,贞元二年,朝廷又把从祀诸武将以“非类弟子”的名义请出了武成王庙,诸葛亮也被罢祀。

③唐代诸葛祠庙当有四:成都、襄阳、岐州、勉县。温庭筠曾写《经五丈原》一诗,内有“象床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两句。所谓“象床宝帐”即是神座与神龛,可见,晚唐时节在岐州已有诸葛祠庙。参见梁福义《五丈原诸葛亮庙溯源》。贞元十一年,《蜀丞相诸葛忠武侯新庙碑铭并序》现存勉县武侯祠文管所。见陈显远编著《汉中碑石》,第110页,《陕西金石文献汇集》之一,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

④原文为“光化五年”,按照宗光化纪元止于四年,是年改元天复,此“五年”疑为“三年”之误写。

⑤据《复斋碑录》记载,“《卧龙山武灵王学业堂记》,李光图撰正书,无名氏篆额。天福三年七月记”。后晋天福三年,中原地区仍称诸葛亮为“武灵王”。

⑥《宋史》言事未及具体时间,《文献通考》记为“开宝三年”。

⑦《宋会要辑稿》“诸葛武侯祠”条下批注:绍兴元年,已封威烈武灵仁济王。《宋会要辑稿》成书艰难曲折,几经整添,多有舛误。据王云海《宋会要辑稿考校·〈宋会要辑稿

>校勘举例》(230页)所言,今见《辑稿》存在“批改补误”,“诸葛武侯祠”条下批注也应当属于此种错误。另外,《宋会要辑稿》“诸葛武侯祠”条已云“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加封仁智忠武侯”先封王再封侯,于理不通,当从《舆地纪胜》。

⑧《宋会要辑稿·礼二十》:“元丰三年闰六月十七日,太常寺言博士王古乞,目今诸神祠无爵号者,赐庙额,已赐额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从其本。妇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号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则锡命驭神,恩礼有序。”

⑨或与关羽在宋徽宗时期的加封速度可比: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加封关羽为忠惠公,大观二年(1108)加封武安王,同样是6年时间,直至封王。

⑩《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一十郊社考》:“至元十五年,敕以春秋仲月上戊日祭武成王。”

⑪民间多种文艺形式,一方面继承了两宋时期的对蜀汉集团感情倾向,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与当时严峻的民族斗争相联系。文艺作品中往往歌颂蜀汉集团的英勇斗争,对其中发挥指导、智囊作用的诸葛亮都是大加褒美。

⑫见《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三》,“洪武二十年七月丁酉”。

⑬见《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八》,“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甲寅”。

⑭明代中期以后《三国演义》流布和影响很大,蜀汉人物借助《演义》的推广而更加深入人心。上至达官显贵,下到贩夫走卒,皆知诸葛亮神机与忠贞,再加上原本有关诸葛亮的灵异传说,诸葛亮崇祀在明清时期在地方祭祀的扩展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⑮参见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一书中的结论部分(341-346页)。

⑯《清世祖实录·卷十五》“顺治二年三月”条。康熙六十一年,历代帝王庙增加从祀人物,赵云入列。

⑰此时,昭烈庙与武侯祠合二为一,这次整修虽然突出了君臣分别,但是祭祀场所和设施仍为一体。

⑱《昭烈忠武陵庙志·专祠》引《华阳县志》。

⑲裕祿《重修襄阳隆中山诸葛忠武侯草庐碑记》,引自张玉琴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隆中碑刻研究》,湖北大学,2010年。

参考文献:

[1] 陈寿. 三国志·诸葛亮传[M]. 北京:中华书局, 2005: 689.

[2] 祝穆. 方輿胜览·成都府路[M]. 北京:中华书局, 2003: 914.

[3] 罗开玉. 三国圣地 明良千古——武侯祠 1780 年回首(上)[J]. 四川文物 2002(6).

[4] 张辅. 名士优劣论[M] 欧阳询. 艺文类聚·卷二十

二[M]. 北京:中华书局, 1965: 409.

[5] 刘森焱,刘艳伟. 关羽与诸葛亮崇拜现象之比较[J].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 2013(4).

[6] 王溥. 唐会要[M]. 北京:中华书局, 1955.

[7] 张唐英. 蜀梼杌[M]. 丛书集成初编[Z].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5.

[8] 赵炳清. 《蜀鉴》校注·卷七[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10: 185.

[9]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册[M]. 北京:中华书局, 1979: 93.

[10] 冯大北. 宋代封神制度考述[J]. 世界宗教研究, 2011(5).

[11] 脱脱. 宋史·礼志八[M]. 北京:中华书局, 2000: 1719.

[12] 陈子龙. 明经世文编·卷四[M]. 北京:中华书局, 1962: 30.

[13] 脱脱. 宋史·宗泽传[M]. 北京:中华书局, 2000: 8963.

[14] 吴自牧. 梦粱录·卷十五[M].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 122.

[15] 王实甫. 西厢记·第二本[M]. 济南:齐鲁书社, 2004: 22.

[16] 陈翔华. 诸葛亮形象史研究[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0: 108.

[17] 程钜夫. 雪楼集·卷七[M]. 丛书集成续编·第135册[Z]. 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8: 69.

[18] 宋濂. 元史·卷二十八[M]. 北京:中华书局, 2000: 421.

[19] 赵克生. 明朝“历代帝王庙”名臣从祀试探——以赵普、武成王为中心[J]. 明史研究, 第8辑, 2003.

[20] 孙承泽. 天府广记·卷三[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4: 30.

[21] 黄晋. 《三国演义》在明清时期的传播与影响研究[D].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70.

[22] 罗贯中. 新刻京本补遗通俗三国志传·卷首[M]. 明万历刊本, 1.

[23] 李复心. 忠武侯祠墓志·祀典[M]. 同治五年(1866)刻本, 57.

[24] 祭汉诸葛武侯墓碑[A]. 李化龙. 汉中碑石[M]. 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6: 183.

[25] 罗开玉. 三国圣地 明良千古——武侯祠 1780 年回首(下)[J]. 四川文物 2003(8).

[26] 冯岁平. 虚白道人及其《忠武侯祠墓志》[J]. 文博, 2000(6).